

翰墨天下雄

中國文學流派精義

目 录

前 言	(1~19)
-----------	--------

戴名世

与余生书	(21)
田字说	(27)
鸟说	(31)
芝石记	(34)
河墅记	(37)
醉乡记	(41)

方 苞

送吴一平舅氏之钜鹿序	(46)
送冯文子序	(51)
送左未生南归序	(55)
送韩祖昭南归序	(59)
书卢象晋传后	(63)
辕马说	(68)
杜苍略先生墓志铭	(70)
陈馥虚墓志铭	(74)
狱中杂记	(80)

逆旅小子	(89)
左忠毅公逸事	(92)

刘大魁

章大家行略	(97)
下殇子张十二郎圻铭	(102)
张复斋传	(105)
奚祠记	(110)
游万柳堂记	(114)
送姚姬传南归序	(117)
《海舶三集》序	(121)
马湘灵诗集序	(124)
顾备九时文序	(129)
息争	(133)
答吴殿麟书	(139)

姚 鼐

李斯论	(150)
游媚笔泉记	(156)
左仲郭浮渡诗序	(158)
登泰山记	(163)
游灵岩记	(168)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171)
祭朱竹君学士文	(174)
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	(178)
快雨堂记	(183)
博山知县武君墓表	(185)

吴 定

答鲍觉生书	(189)
-------------	-------

恽 敬

谢南冈小传..... (195)

游庐山记..... (198)

纪言..... (204)

张惠言

周维城传..... (208)

书山东河工事..... (212)

吴德旋

丁晨晖六十寿诗序..... (217)

陆继辂

与友人书..... (220)

陈用光

送刘孟涂南归序..... (223)

方东树

书史忠正公家书后..... (227)

刘 开

问说..... (233)

管 同

蒯通论..... (239)

记鸽..... (245)

灵芝记..... (247)

饿乡记..... (250)

姚 莹

捕鼠说..... (255)

再与方植之书..... (259)

梅曾亮

观渔..... (265)

书杨氏婢·····	(267)
书棚民事·····	(269)
钵山余霞阁记·····	(272)
赠孙秋士序·····	(275)

朱 琦

名实说·····	(279)
----------	-------

鲁一同

关忠节公家传·····	(283)
-------------	-------

龙启瑞

书郭玉传后·····	(292)
------------	-------

王 拯

婴砧课诵图序·····	(295)
-------------	-------

吴敏树

亡弟云松事状·····	(299)
君山月夜泛舟记·····	(305)

戴均衡

《南山集》目录序·····	(309)
---------------	-------

曾国藩

原才·····	(314)
欧阳生文集序·····	(318)

张裕钊

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	(324)
游狼山记·····	(330)

黎庶昌

卜来敦记·····	(334)
-----------	-------

薛福成

变法·····	(338)
---------	-------

观巴黎油画记·····	(345)
-------------	-------

吴汝纶

弓斐安墓表·····	(349)
------------	-------

跋蒋湘帆尺牘·····	(353)
-------------	-------

林 纾

苍霞精舍后轩记·····	(356)
--------------	-------

湖心泛月记·····	(359)
------------	-------

湖之鱼·····	(363)
----------	-------

赵聋子小传·····	(365)
------------	-------

马其昶

赠太仆寺卿南昌知县江君家传·····	(369)
--------------------	-------

姚永概

《畏庐文续集》序·····	(374)
---------------	-------

前 言

桐城派是清代一个规模极大的文学流派，它独霸文坛二百五十余年，其发展几乎与整个清王朝的历史相始终。在思想上，桐城派崇尚程、朱理学，尊奉封建道统；在文学上则以桃继秦汉唐宋文统相标榜。它高张旗帜，广纳门徒，前后相承，互为推举，传人遍及江南大部分地区，吴、湘、赣、粤均繁衍出桐城支派，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仅有宋代的江西诗派还约略可与匹敌，以致当时即有所谓“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称誉。

—

桐城派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槐和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而得名。它兴起于康熙、雍正两朝，盛于乾隆、嘉庆年间，崛起于十七世纪中叶。它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招致了汉族士民的普遍反对，知识分子从思想到行动都往往与新政权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或者从“华夷之防”出发，辗转投奔南明政权，坚持武力抗清，失败后则隐迹林泉，借诗文以写其旧国旧君之感；或者多方抵制清王朝的征聘，直接

在江湖间终此一生。到康熙即位，统治者也终于明白，完全仰仗刀剑是不足以巩固新政权的，根本的一点还须使自己的统治在思想上与汉民族传统的封建观点相适应，使政权同样取得“正统”的地位，并为汉族士民所广泛承认。于是，从批驳“华夷之防”出发，一再引《孟子·离娄下》中孟子的一段话为证，说明不应以“夷夏”之别来区分谁为“正统”。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本意原指圣人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其道则一。清王朝统治者则借以来证明“华夷之防”的错误，而与此同时，又确立以程、朱理学作为其封建政权的理论基础。康熙明确肯定：“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系也”（《四书讲义序》）。又说：“非此不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制朱子全书序》）。于是进而将朱熹引进孔庙，封为“十哲之次”。康熙自己，则以九五之尊身体力行，不避寒暑，“学讲”程、朱，以显示其为道统的继承者，进而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便是开始改变清初将反抗者斥为“流贼”而一力褒扬投降者的政策，转而大力提倡忠孝节义，褒扬忠于故主，为明王朝死节之臣。同时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罗致天下名士，录取者一律授以翰林院官职，又于笼络之外，辅以杀戮之一手，清初“《南山集》案”中杀戴名世而赦方苞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恩威并施的结果，直接造成了汉族知识阶

层的分化，一些人也终于不顾人们骂为“晚节不忠”而先后集结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大礁之下；民族矛盾的和缓、新政权的巩固又反过来加速了这种臣服的过程。

这样一种政治方策，必然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政策，这套政策的核心便是使文章发挥义理，关系世道。《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辛酉上谕云，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所贵也。”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乾隆年间。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上谕，即批评前代明经制策之文“流派皆不纯正”，以为“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庚辰上谕又说：“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而这恰恰是唐宋以来，为封建正统文人所共同尊奉的古文创作准则，它很快被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所接受，也就势所必然了。如果将桐城三祖尤其是方、姚两家的古文理论和政治态度，与这一阶段清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作一横向比较，便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有许多极相近的地方。所以，从大背景上说，桐城派的出现，其实是清王朝在巩固其政权及稳定政权后文化政策的历史产物。这一点，几乎影响及于桐城派的整个兴衰历史，决定着它的历史走向。

桐城派崛起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在散文发展自身。《四库提要·尧峰文钞》说：“古文一派，自明代肤滥于七子，仟佻于三袁，至启、禛而益敝。国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汪）琬与魏禧、侯方域称为最工。”这里勾画的虽是明清文变的轨迹，

但实际情况却比这远要复杂。古代散文在唐宋八家手中经历了它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后,从南宋开始便日益下跌,金、元两代则进入较为萧条时期。明初虽有浙江文派倡导恢复唐宋正统古文,但很快被珷璃冗沓的“台阁体”所替代。于是便出现了力挽颓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一开始便尺尺寸寸于古人,“刻意古范,铸形宿模”(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走上了模拟剽窃的道路,创作了一大批秦钟汉鼎式的赝品。这招致了“唐宋派”和“公安派”作家的猛烈抨击。“唐宋派”标举八家古文,主张上续唐宋正统,以唐宋模式替代无法可循的秦汉古文。“公安派”则主张独抒性灵、信出手腕,以无法为法。他们虽然扫除了文坛模拟剽窃的风气,但也未能振起一代,更加公安末流的狭隘浮薄,也大大削弱了它自身的影响,于是又有了“竟陵派”的纠偏,而这时已近于明清嬗代了。因此,才有了清初魏禧、侯方域、汪琬等导乎先路的古文振兴活动,他们全面回顾了明代门户林立时期各派文论的得失,重倡韩、欧古文理论。这实际上也是明代“唐宋派”古文的延续和发展。而传统古文理论的理与法,以及“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口号在客观上正迎合了清王朝文化政策的核心精神。桐城派早期作家对此也有着和他们相同的认识。戴名世《己卯行书小标题序》说:“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他批评前代天启、崇祯文风说:“文风坏乱,虽有一二钜公竭力涸柱,而文妖迭出,波荡复生,卒不能禁止”(《庆、历文读本序》)。方苞则更为明确地表示:“学行继程朱之

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引),以接续唐宋道德、文统为己任。这样一种态度,自然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他们既不同于清初倡导通经致用的颜、李学派,也不同于乾、嘉年间以烦琐考据为特征的汉学派。他们的文章虽然“模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刘师培《论近世文章之变迁》),但毕竟近于文学的特质,而不似汉学家那样追求朴拙,忽视文学色彩,因此也更符合古文写作的要求。所以刘师培说:“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刘师培是骈体文派的理论家,和汉学家一样,对桐城派持有门户之见,但这段批评,却也可使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到桐城派形成过程中出自散文发展自身的原因。

二

桐城派从形成到衰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经雍正至乾隆年间,是其创始时期。代表作家有戴名世、方苞和刘大槐。在这一阶段他们虽没有开宗立派的意图,但从文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则都为后来桐城文派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往论桐城派,多不提戴名世,桐城后学称“桐城三祖”也将他排除在外。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无疑是清代文字狱异常严酷的结果。直到道光年间,其宗族

后学戴钧衡才搜佚辑残，重编《南山集》并为之序，在序文中以愤愤不平的口吻首次提出了戴名世的宗祖地位问题。但此书也延至光绪年间才得刊行，而这时梁启超也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定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开山之祖”了。

戴、梁二家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在桐城派的前孕阶段，戴名世确实是一位上承侯方域、魏禧的重要作家。他之被害，和他的文论本身并无多大关系，而是他思想倾向与出处行藏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而导致的人格悲剧。他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怀恋故国，奉南明政权为正统，诗文中也常常宣扬一种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主张；而另一方面，却又耐不住寂寞，终于两度出山，应科试，求入仕，博得两榜出身，跻身于朝廷。但对现实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牢骚又往往溢于言表，最后终于为政敌所构陷，在康熙恩威并施的政策下屈死于政治争斗之中。后人所以不将其列入桐城宗祖，则全然是出于这种政治上的忌讳。而在实际上，他对桐城派的形成则有着导乎先路的作用。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道”、“法”、“辞”三者合一的主张。除上文所引《己卯行书小标题序》的论述外，他还在《丁丑房书序》等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道与法合”的主张，这实际上是方苞“义法”说和姚鼐“道与艺合”理论的先导。其次，是提出了精、气、神统一的观点，这可见于他的《答张、伍两生书》。所谓精、气、神统一，概括地说，就是以雅洁之文，充沛之气，表现真挚的情感，广阔的心胸，刚毅的气质，“夫惟雅且清则精”；“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

以为神也”；而“杰然有以充塞乎两间而盖冒乎万有”，则“为气之大过人者”。后来方苞关于“雅洁”的主张，刘大槐的“神气”论，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则显然与戴名世上述认识有极密切的关系。

“《南山集》案”标志着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斗争的基本结束，他们在康熙“恩威并施”政策的促使下，终于度过了这一痛苦的转变过程，在“《南山集》案”中被康熙特赦的方苞也成为了这一转变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散文便明显地体现出这期间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的民族意识还时有流露；另一方面，又毕竟已大势所趋，更加新王朝又对他恩宠有加，他对清王朝时弊的指斥乃至对前朝覆亡的反思，也便渐渐地转变为服务于整肃封建纲常、维护新王朝统治的手段。在这期间，他逐渐地完成了对“义法”说的阐发，使之成为了后来桐城派古文的纲领与原则。

“义法”是方苞文论的核心内容。《又书货殖传后》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一理论本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方苞桃继来以为古文写作的准则。在这里，“义”的“言有物”虽是就文章内容的充实而言，但有一个基本的准则，那就是载道与传道，“古文则本于经书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根本目的还在于正王道、纪人伦。而为此，文章就须“条理精密”，讲究法度。方苞以为，“法”包括许多具体内容，如布置取舍，应脉络灌输；如繁简适度，讲究详略；如语言雅洁，载事不

杂等等。这些主张和唐宋大家的文论无疑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唐宋古文理论的提出是为了革除颓败文风，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方苞的“义法”论虽也有革弊复古的意图，但同时又被纳入了清王朝建立万世治统的轨道，企图将理学与古文结合起来，以恢复“道统”、“文统”合一的传统，进而成为确立万世治统的工具，这无疑又是保守与倒退的。

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种古文理论，得到了清王朝统治者的赏识。尤其是雍正十一年，方苞代果亲王允礼选编《古文约选》一书，更促成了这一理论的传播。方苞在此书的序例中再次阐释了他的“义法”理论，强调“道统”与“文统”合一的主张，明确表示此书以“助流政教”为选编“本志”。这实际上是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义法”的范本。此书当即被采用，“刊授成均诸生”；至乾隆初年，又“诏颁各学官”，成为了“钦颁”的古文教材。这在以科举取士，又强调“以古文为时文”的情势下，这一理论为广大士人所重视，乃至奉为圭臬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桐城文派在其二百余年的演化中，一直将它奉为文派的理论旗帜，和这种“钦定”的权威性则也不无关系。更加方苞的散文又以简严精实著称，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出现于清初文坛，确有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光明甫说：“文至灵皋见大醇，铅华不御自丰神。精微洁静桐城法，五百年来有此人”（《桐城派略论·论文诗说》）。在桐城派的创始过程中，方苞从理论到创作，都为文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大槐稍后于方苞，清初的反清思想对他没有多

大的影响。但他一生都不得志，散文中既不大赋颂功德，粉饰盛世；也不大指斥时弊，揭露黑暗。更多的是在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处于下层的知识分子中那种“不得帮忙的牢骚”，他的古文理论因而也不像方苞那样一力强调“助流政教”，而更着重于“法”的一面。这种审美追求使他成为了拓展桐城廊庑的重要人物。

刘大槐的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对散文艺术作了更深入的探究，指出在义理、书卷、经济之外，艺术本身还有相对的独立性，“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于是他拈出神气作为论文的极致。《论文偶记》说：“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以此为中心，他再广泛地论及文贵奇、贵高、贵大、贵远、贵简、贵变、贵瘦、贵华、贵参差等许多艺术方面的规律。这较之于方苞，无疑是大大拓展了散文的艺术天地。此外，刘大槐又是桐城大家中第一位聚徒讲学的人，他借讲学宣传古文理论，培养后学。“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便出其门下。它如王灼、吴定、程晋芳、钱伯颢等也都是其入室弟子。王灼、钱伯颢又再传至恽敬、张惠言，衍化出后来的阳湖派。因此，刘大槐实际上是为桐城派的崛起培养了最初的一支作家队伍。到刘大槐晚年，桐城文派已经是初具规模了。

桐城派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乾隆中期至鸦片战争前后。这是姚鼐和他的门弟子活跃于文坛的时期。桐城派不但师友标榜，公开打出了文派的旗帜，而且形

成了强有力的作家集团，衍化出了阳湖、金陵、江西、湖南和广西等许多支派，进入了它的全盛期。

桐城派所以在乾隆中期以后能形成流派，并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姚鼐是位关键性的人物。这种影响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首次勾画出由方苞经刘大槐至自己的师承关系，并揭出时人所谓“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赞叹，并预言桐城一地“儒士兴，今殆其时矣”。这实际上是引出了桐城文派的端绪，打出了文派的旗号。第二，在文论上，姚鼐熔贯戴、方、刘三家而集大成，使桐城文派的理论走向了完整与严密。这套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二是提倡“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三是阳刚阴柔风格论。它吸取了汉学的某些长处，但依然固守宋学的轨范。与此同时，他又编选《古文辞类纂》，以醇雅为标准，由唐宋八家上溯战国秦汉，下又以归有光、方苞、刘大槐继承唐宋八家，“以为古文传统在是也”（方东树《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表现出以此建立文统的明显意图。此书因而也成为了桐城文派的一部法典。较方苞的《古文约选》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与作用。第三，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因与馆客中的汉学家不合，于壮盛之年辞官归里，然后，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弟子遍及大江南北。这种递传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桐城文派的蔚然兴起。

过去论桐城派，有两种颇值得商榷的观点：一是不以阳湖派为桐城支派；二是认为自姚鼐之后，桐城

派处于衰落阶段，梅门弟子面对历史的变动，苦苦维系着桐城家法，支撑着桐城门户。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偏颇。阳湖派由刘门弟子王灼、钱伯颢递传而来，这在它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如张惠言、陆继辂的文章中早已说得非常明白，而它们在文论主张上和桐城三祖的一些不同，乃是社会变动影响的结果，这种变化在姚门弟子中也同样显示着。阳湖派活跃于文坛时，正是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姚莹等受业于姚门的时期。当阳湖派余波未歇时，姚门弟子紧接着崛起，梅、管因是上元（今南京市）人，后来刘师培将他俩称之为金陵派，但这期间真正蔚成支派的，还是由鲁絜非、陈用光、吴嘉宾为代表的赣派，由朱琦、吕璜为代表的粤派，由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为代表的湘派。再加上安徽本土的刘门弟子及姚门弟子，桐城派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因而这是它最为鼎盛的阶段。即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所勾画的大江南北宗派流衍的阶段。桐城弟子也并非在苦苦支撑着门楣。相反，而对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继承桐城家法的同时，又试图加以改造，使桐城古文顺应社会的变化。这种改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突破方、姚“明道义，维风俗”的范围，转向经世致用，以古文反映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事件，剖析社会政治形势；二是促成文风出现了不同于方、姚雍容平和的转化，或多或少地显示出慷慨任气的倾向。梅曾亮、方东树、王拯、鲁一同、姚莹便都是这种转化中的代表人物。

桐城派在这一阶段后期确也曾出现过一個短暂